

A Patriarchy Text—Analysis of *Reconciliation*

Zhiyu X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Email: xzy6311@hotmail.com

Received: Jun. 10th, 2013; revised: Jun. 27th, 2013; accepted: Jul. 2nd, 2013

Copyright © 2013 Zhiyu Xie.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Abstract: The novelette *Reconcilia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Modern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On the one hand, it carr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mily Novel” of Meiji period, which depicts family relationships;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played a normative role in the post-war “Family Novel”, which emerged in 1950s. According to this paper, however, the novelette also reflects Shiga Naoya’s flaunting of patriarchy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gender images, the author seeks to analyze that the work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le power center consciousness, which is another characteristic of the whole body of Shiga Naoya’s works.

Keywords: Gender; Images; Compliment; Despise

一个男权话语的文本——解读《和解》

谢志宇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 杭州
Email: xzy6311@hotmail.com

收稿日期: 2013年6月10日; 修回日期: 2013年6月27日; 录用日期: 2013年7月2日

摘要: 中篇小说《和解》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继承了明治文学中家庭小说的特点, 同时它又对战后五十年代的家庭小说起到了规范性的作用。笔者认为, 这篇小说同时还表现出作者对男权、父权的炫耀, 以及对女性的歧视。笔者通过对作品中性别形象的解读, 分析这部作品所具有的男权中心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是志贺直哉文学的另一大特征。

关键词: 性别; 男权; 炫耀; 蔑视

1. 引言

志贺直哉(1882~1971)的中篇小说《和解》最初刊登在1917年10月号的《黑潮》杂志上。第二年他增补了描述妻子分娩的第十章后, 将其收入到新潮社出版的、自己的作品集《夜之光》中。

《夜之光》中的《和解》共十六章, 讲述了主人公“我”(名叫顺吉)和“父亲”从不和到和解的过程。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我”在寻求和解过程中的

内心活动。其中穿插着“我”的一些回忆, 以及大女儿夭折, 二女儿出生等人生悲喜交加的事件及其感悟。

志贺直哉是私小说作家的代表, 其小说多以“我”为主人公, 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手法, 表现“我”——男主人公的思索、心境。他的许多作品表现了男性在家庭内的绝对统治权和父权。在他的笔下, 男主人公往往自怜和自恋, 对身边的女人带有蔑视感, 如《和

解》中“我”对妻子，《暗夜行路》中主人公谦作对阿荣和直子等。有感于《和解》的这一特点，笔者从男权、话语等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作品中的性别形象进行解读，最终达到认识志贺直哉文学所呈现出的另一特征的目的。

对家族、家庭内男性的权威、地位以及男权、父权的充分炫耀，是《和解》在人物刻画上的最大特点。作者从不同角度竭力表现男性在家庭中的绝对重要性以及对家庭的发展、父子和解所起到的种种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作者露骨地表现了男性，尤其是父亲和“我”对家庭中的女性，尤其是“我”的妻子——康子的绝对支配和女性逆来顺受的妇德。《和解》与同时期问世的其他小说相比，这一特点尤为明显。

2. 对男权、父权的炫耀

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共五人：祖父(已去世)、父亲、“我”、叔父(名叫阿正)和弟弟顺三；女性主要有祖母、生母(已去世)、继母和“我”的妻子(名叫康子)。我们首先来看看作者在小说中对祖父形象的刻画。

小说中的祖父已经去世，但在作品中作者将他刻画成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决策者，是直接影响“我”和父亲关系发展的核心人物。对“我”来说，祖父既是精神上的支柱，也是行动的力量源泉。祖父无形的力量一方面通过“我”与他在心灵上的交流支持着“我”，另一方面通过祖母的存在而影响，甚至制约着父亲。例如小说的一开始，“我”去给祖父和去年夭折的大女儿扫墓，当时“我”正犹豫是否去位于麻布¹的父母家看望祖母时，正是祖父的一句话促使了“我”决定去父母家。

我在祖父的墓前踱步片刻，祖父便出现在我的心里。我以请教的口吻对祖父说“今天我想去看祖母？”祖父立刻回答“那就去吧”。我就希望祖父这样回答^[1]。

通过这一设定，作者显然是要告诉读者祖父所具有的非凡力量。从故事后来的发展来看，祖父的这句话对“我”来说决非仅仅是劝导，而是引导“我”与父亲进行和解的关键词。祖父出现在小说的开头，劝“我”去父母家看望祖母。其平和的语调让“我”感到自己愧对父亲。“虽然由于不愉快的关系，自己明显对父亲抱有许多埋怨，但自己心中的祖父却丝毫没有指责父亲的意思^[1]”。这段话暗示了“我”抱有与父

¹日本东京的地名。

亲和解的念头，“可以说，在这里‘我’已经预感到向和解倾斜了^[2]”。虽然祖父去世多年，但在“我”的心目中，家族的统帅者并不是父亲，依旧还是祖父。因而对父亲的态度显得傲慢无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祖父的无形存在既是导致父子不和的原因，最终也是促使父子和解的力量之一。竹盛天雄指出，“‘我’的背后有着祖父母强大的身影，因此对立并非只是单纯的父子之争。”可谓一语破的。虽然祖父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作品里，但可以说，祖父在这篇小说中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3]。

小说中的另一个男性形象是父亲。作为祖父的继承者，父亲在家族中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他的其喜怒哀乐直接影响着作品中其他人物的一举一动。不仅和他生活在一起的祖母、继母时常需要忍气吞声，“我”自己在出入父母家时也不得不被他的威严所吓倒。我们通过解读，以及将和解前后“我”的心境进行对比，不难看出父亲这一男性形象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高大和威严。相比夏目漱石的《从那以后》、森鸥外的《仿佛》中的父亲形象来，《和解》的父亲形象要显得威严和冷酷得多。例如在小说的第二章，“我”偷偷到父母家去看望祖母，这时恰好父亲回到家里。在祖母房间里“我”与父亲不期而遇。“我由盘腿坐着的姿势改成跪坐的姿势，点了个头，含糊地算是敬礼^[1]。”可见我的紧张和尴尬。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后的沉默^[1]”，父亲当即“显示出不愉快的表情^[1]”，走出祖母房间。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陷入在不愉快的情绪之中，甚至引起身体上的不适而卧床。在小说的第三章里，父亲因为“我”的无礼，正式对“我”下了逐客令，不允许“我”再随意进出他的家。作为家族权力之长，父亲不仅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甚至还可以宣布与“我”断绝父子关系。

从历史上来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延续着父权制。按照明治民法的相关规定，长子是家族(家庭)的继承者，婚后仍然要和父母住在一起，负有赡养父母的职责。而在小说《和解》中，作为长子的“我”婚后不仅没有和父母居住在一起，而且后来还被父亲赶出了家门。在小说中，“我”之所以向父亲寻求和解，主要原因是“我”看到父亲日渐衰老，另外是自己作了父亲，经历了失去孩子的痛苦，体会到了做父亲的辛酸苦辣。但我们认为这其中还另有原因，那就是“我”害怕父亲会与自己断绝父子关系，

最终被家族彻底地抛弃。另外在第十六章里，因为与父亲和解，为了表示对父亲的感激，“我”决定送给父亲一幅肖像画，于是又去了东京的父母家。父亲当然十分高兴，随即说：“阿正(今天)不在场，有点遗憾！今天刚好全家都到齐了，我们到哪里吃饭去！”^[1]其实，当时不在场的还有“我”的妻子，但读者从父亲的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在他的眼里，叔父是家族的成员，但“我”的妻子并不是家庭成员。此外，当时同样不在场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我”的弟弟顺三。父亲的态度又如何呢？“我”这样描述到：

(前略)始终不见弟弟顺三回来，父亲越来越急，让家里人给弟弟常去的几个地方打电话问问。(中略)到了餐馆也不见顺三来。父亲出乎寻常地对此有些生气。

“该到的人却没有到，总是不放心！”父亲似乎有些辩解地说。……自己希望在父亲还没有发脾气前，顺三能赶到。……我们刚开始吃的时候，顺三来了。父亲的心情一下好起来^[1]。

从对顺三的态度上读者不难看出家族中的男性在父亲心中的地位。实际上在这篇小说中，弟弟顺三就只是在这里出现过一次，对这篇小说表现父子和解的主题并没有多大关联。但如果我们从作者竭力表现男性地位的角度来看，就不难发现弟弟这一形象在小说中所具有的意义。男性的到齐对于家族的这顿团圆饭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是男性的缘故，也就是父亲所说的“该到的人却没有到，总是不放心！”。换言之，不论是父亲还是“我”，都没有将女性——“我”的妻子当作自家人看待，也不是什么“该到的人”，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考虑她是否在场。

叔父阿正虽然在作品中出现的次数不多，但每次都是在故事最关键的时候登场。这一点也恰好说明了作者在《和解》这部作品对男性地位的展示和炫耀。在第十三章中，“我”决定去父母家与父亲和解，“我”从上野骑自行车去麻布。到了父母家门口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放在门口的叔父的拐杖^[1]”。接着在和解即将开始时，父亲让女佣把叔父请到书斋来，作为父子和解的见证人。父子和解的场面可以看作是这部小说的高潮。作为家族内的父子和解，这种时候在场作为见证人的不是祖母或母亲，而是叔父，可见在父亲看来，家族男性的存在要比女性重要得多。虽然在父子

和解后，母亲也来到书斋里，但却是来感谢叔父和“我”的。

母亲见此情景，立即站起身走过来，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断对我鞠躬点头，哭着说：“谢谢！顺吉！谢谢！”

母亲的头一直低到我的胸前。没办法，我也向她还礼。自己刚一低头，母亲正好抬头，我的嘴巴碰到了她的头发。

母亲又走到叔叔跟前，衷心地感谢他说：“阿正！谢谢你！谢谢！”

“立刻去告诉祖母！”父亲对母亲说。母亲擦着眼泪，立刻走了出去^[1]。

3. 对女性形象的描写

与男性形象相比，《和解》中的女性则总是温顺、忍耐的形象，恪守妇德，逆来顺受。例如与祖父的巨大力量相比，祖母显得弱小无力。虽然作为长辈受到父亲和“我”的尊敬，但她和继母一样，夹在“我”与父亲不和的尴尬境地之间，束手无策。父亲深夜将“我”逐出家门，祖母虽然愤怒，却无可奈何。长孙死后，由于父亲“我们不再去赤坂²了！”^[1]的命令，她甚至无法来送葬，仅能用沉默和颤抖的嘴唇来表达自己的悲痛。祖母生病后，父亲固然也会去祖母的房间里问寒问暖，但那也只是出于礼节。父亲就自己所做出的决定是不需要去与祖母商量的。例如父亲不允许“我”随意进出他的家，实际上限定了“我”随意去看望祖母。但“我”很想念祖母，祖母也很想念“我”，往往只能是趁父亲不在家时，“我”才能偷偷跑去看祖母。对于父亲的这一决定，祖母虽然很生气，但也不便多说什么。

“我”的生母早已去世。在“我”去青山³扫墓时，也到了她的墓前。但与之前祖父清晰有力的形象相对照，“像胆小怕事的女人一样，母亲含糊其词。于是自己不想理她，从她墓前走过^[1]”。可见生母在“我”心中的份量远远不及祖父。

继母为父子和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她是“我”了解祖母情况，和麻布的家保持往来的联系人。也是由于她的劝说，我终于尝试以实际行动寻求和解。

“我”对她怀有感谢之情，在父子和解后，“我”在SK的家就给她写信表示感谢。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2,3}日本东京的地名。

继母在父权和夫权的力量下显得软弱无力。父亲几次通过继母传达对“我”的“逐客令”，她虽然不愿意，有时露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1]”，但是从来无法从语言或是行动上进行反抗，只能听从命令好言劝说“我”离开。第十三章里，为了父子能顺利和解，继母从早上起就不断拜佛祈祷。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她期盼父子和解心切，另一方面也看出她因为自身的无力而只能求助于神佛。贯穿作品前后，继母的行动大多是遵守父亲的命令，小心谨慎地伺候丈夫、婆婆，以及在父子和解后“哭泣”和“一个劲儿地低头致谢”。可以说，女性所表现出的逆来顺受、哭泣和对男性的依附是这部小说在女性人物刻画上的最大特点，而这一特点又充分体现在“我”妻子——康子这一人物形象上。

父亲对康子的态度冷淡、言词粗暴，几乎没有将康子视为家庭成员。作为家族之长，父亲的威严不仅表现在对“我”的冷酷和严厉上，还不断地表现在对“我”的妻子、妹妹的态度上。在战前的日本人的普遍观念中，妻子作为外来血缘关系，长期以来被排斥在丈夫家族的血缘关系之外。换言之，公公和丈夫往往并没有将儿媳或妻子当作家族的成员，妻子只是丈夫家族内生儿育女的工具，甚至是一个女仆。我们从这部作品中也能看到这一点。在第八章，“我”和妻子去给孩子上坟，然后妻子一个人去麻布休息。走进父亲的房间，刚刚遭遇丧子之痛的妻子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安慰，反而被父亲叱责为什么要把孩子的遗体运到东京来？在第十五章里，父子和解后，父亲第一次从东京到“我”的家来玩。见到“我”妻子后，父亲对她说：“顺吉希望今后永远和我保持父子关系。我也真心希望如此。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你也必须这样对我！^[1]”从如此严厉的措辞中可以看出父亲对儿媳的态度。这位父亲本来是在对儿媳叙述父子的和解，但话语却习以为常地变成了对儿媳的命令。可以看出，父亲根本不会去考虑儿媳的人格和内心感受。听了父亲的这番话后，“妻子”却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劲儿地点头。而身为丈夫的“我”，对康子的态度和行为又怎样呢？在作品的第二章里，“我”因为在麻布的父母家看到“父亲(对我)显示出愉快的表情^[1]”，于是闷闷不乐，脸色阴沉地回到自己家中。妻子见状，一方面感到不安，同时立即放下婴儿，过来给“我”揉腰。这时“我”推开她的手，并大声骂道：

“反正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呆着。不愿和你这样的家伙呆在一起！^[1]”这是何等粗暴的言词，赤裸裸地反映出“我”对妻子的蔑视和人格的污辱。在第三章里，“我”和父亲言词不和，最后父亲对“我”下了逐客令。“我”回到睡觉的房间，一边换衣服，一边叫妻子立刻离开父母家。继母和妻子一边哭一边拉着我的手，劝我冷静一些。虽然“我”明知妻子此时已经有了身孕，但竟然将她猛地推到在地板上。走出父母家后，在夜深人静的大街上，“我”又威胁妻子说：“如果你对我刚才的行为有任何不满意的话，我们就不是一家人！^[1]”毫无疑问，在志贺的笔下，“妻子”常常无缘无故地成为丈夫发泄内心不满的工具和无端蔑视的对象。

如果说祖母和继母作为长辈，尚能表达一些自己的不满。康子对于公公和丈夫的态度、言辞和举止，则没有显示出任何的不满，在被丈夫当作出气筒，受到委屈时，更多的还是哭泣和沉默。她在家小心伺候丈夫，精心抚育孩子，在外紧紧跟在丈夫的身后，听从丈夫的吩咐。在小说中可以看到，“我”与父亲的联系几次都是强迫妻子代为传达的。小说第三章，父亲来京都看“我”时，“我”强迫患有神经衰弱的妻子将自己的信交给父亲，并威胁说：“如果你没有把信交给父亲就回来的话，我马上就回到东京去！^[1]”。在康子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作者对她的妇德穿插了一些赞美式的描述。例如第四章里，她告诉我父亲来看望长孙的事，“说起这事，妻子总是抑制不住满脸的喜悦^[1]”。因为“我”没有一起去麻布，“妻子那天一大早就带着孩子回我孙子⁴去了^[1]”。第十四章，“我”和父亲和解后回到家，仆人告诉我“已经都打扫好了。太太领着我们把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1]。”“走到家门口的坡道前，看到妻子已经站在那里。妻子默默走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说：‘恭喜你！’^[1]”从总体上来看，作者笔下的康子给人一种没有性格，没有头脑，甚至寡言少语的木讷形象。虽然小说中专门有一章描写康子分娩，其中也刻画了她的坚强和毅力，但助产护士活泼和自信的形象却分明要比康子丰满许多。继母和康子，两位同样身为“妻子”的女性，夹在父子关系间受尽责难和威胁，并不能表现出任何的不满。笔者认为，虽然作者志贺直哉可

⁴我孙子是地名。主人公“我”居住于此。

能并非有意这样描写女性，但这也正好反映出他对女性的歧视，同时表现出日本女性在封建家族、家庭中低下的地位。

4. 结论

作为一篇描写二战前日本家族关系的小说，《和解》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继承了明治时代全面描写家族关系的家庭小说的特点，即探讨大家族与小家庭的矛盾；同时它又对战后五十年代复兴的家庭小说，特别是战后“第三新人”的小说，如安冈章太郎的小说起到了规范性的作用。通过《和解》这篇小说，我们同时还可以看到二战前日本父权制家庭中亲子、夫妻的关系。这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家庭中男性的绝对支配权、高高在上的地位和女性在家庭中，尤其是妻子深受公公、丈夫歧视的客观事实。通过对这部作品的研读，我们看到作者志贺直哉对男权、父权的炫耀以及对女性的歧视。针对这一点，日本学者曾提出过批评的意见，如胜本清一郎在《谷崎润一郎和志贺直哉》一文

中就指出：“志贺的作品表现了丈夫的霸道和妻子逆来顺受的妇德。……表现了男性的统治、丈夫的统治以及父亲的统治^[4]。”

志贺直哉是白桦派作家之一。他出身贵族家庭，生活优裕，在自己的作品中宣扬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又被誉为“正义派”。不过，从他的这部《和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品的另一面，即极端的男权中心主义和对女性的蔑视。笔者认为，这是志贺直哉文学的另一大特征，我们不应该忽略它。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志贺直哉, 著, 谢志宇, 译. 和解, 现代日本文学全集 20『志贺直哉集』[M]. 日本: 筑摩书房, 1954: 356-405.
- [2] 山田有策. 和解的结构. 制度的近代藤村·鸥外·漱石[M]. 日本: 樱枫社, 2003.
- [3] 竹盛天雄. 志贺直哉的父与子——近代文学史的视角[A].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志贺直哉Ⅱ》[C]. 日本: 有精堂, 1978.
- [4] 胜本清一郎, 谷崎润一郎, 志贺直哉.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志贺直哉Ⅰ》[M]. 日本: 有精堂, 1977.